

在人类生活中,有一种最真挚、最深沉、最崇高、最圣洁的情感,那就是母爱。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表现人间的爱恨恩仇,其中最能动人心弦的,就是抒写母爱。冰心先生一生秉承“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她笔下的母爱,不仅是血缘亲情之爱,而且包含着以母亲之心关怀众生。她不仅在用笔抒写,而且身体力行。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冰心与五个孩子的故事,便是一件突出的例证。那是我今生久久难以忘怀的一段动人的故事——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每到传统节日春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幼团聚一起,欢欢喜喜过新年时,冰心老人家里总会有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给她来拜年。

每当冰心身体不适或生病住院时,必定会有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捧着鲜花到医院亲切慰问老人。

这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是谁呢?为什么和冰心老人亲如一家人?——他们便是当年在北京颇有名声的“五个孤儿”。

四十多年前,由于作家冰心采访过“五个孤儿”,写过一篇颇具影响的报告文学《咱们的五个孩子》,从此孩子们和冰心奶奶结下了不解之缘,凝成了深厚的亲情。

当时,一九六一年六月和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北京崇文门外东唐洗泊街一家五个孩子——周同山、周同庆、周同来、周同贺、周同义兄妹,不幸相继失去了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崇文区第一煤厂的工人,母亲是街道纸盒厂的工人,都是由于长期生活条件不佳积劳成疾因病去世的。那年,最大的孩子周同山才十五岁,正在念初中;最小的同义只有三岁;二女儿同庆十岁,正在上小学;男孩同来八岁,刚刚踏进学校门;还有一个女孩同贺,仅六岁。这么小的几个孩子突然相继失去父母亲,一时无依无靠,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很快,街坊邻居、社会各界都向孤儿们伸出了友谊之手,援助之手!退休工人马大爷,每天等几个孩子上学去了,替他们操心着家里的火炉子,照着看留在家里的小同义;李玉琴大娘热心帮助孩子熬粥、炒菜;衣服、被子破了,潘淑兰阿姨帮着同庆缝补,而且教孩子怎么穿针引线。同院的田淑英大姨更是不分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天天几趟出入同山家。学校老师同样无微不至地照料孩子。街道办事处还特地派了一位女干部边琴关照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并且代表办事处宣布:国家供养他们读书,每月还有生活补助费。报纸、电台发表和播发了这则消息后,社会各界援助孤儿们的人更多了!有的人从外地汇来款,寄来衣物,还有出差路过北京的旅客千方百计地来到他们身边,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这便使得孤儿不孤。

作家冰心知悉此事后,十分

关心和同情五个孤儿的遭遇,她答应为《人民文学》写篇报告文学,报道此事。于一九六四年春天,便由我陪同进行采访。当时冰心已年逾花甲,而且家住北京西郊,可她仍然将采访的日程安排得很满。五个孩子的家在城内东区崇文门外一带,从西郊来,路程很远,即便我们用车接送冰心,但那也是东奔西跑啊!

冰心采访得十分深入细致,严肃认真。大约前后半个月的时间里她几乎天天进城来,今天访问邻居大婶大嫂,明天访问街道干部,又要关心几个孩子的学习和冷暖。通过时间长短不同的接触,先后采访了几十人之多!临了,因为我们始终没有见到正在幼儿园的最小的孩子同义,冰心说一定要去幼儿园看看小同义!

我们到了幼儿园后,小同义正在床上睡得很香甜。老师问要不要把他喊醒?冰心说:“不用,不用,让他安安静静地睡吧!”冰心却轻轻地走到床前俯身亲吻了一下小同义,我们便告辞了。

冰心采访,不是刻板地有闻必录,而是仔细倾听对方的诉说,她是用心在感受,在交流,所以只在极关键处在笔记本上记下几行字,帮助自己记忆,而我作为她的助手,就要记录得详细一点了,以便事后引发她的回忆。

不久后,冰心经过酝酿思虑,写出了报道“五个孤儿”事迹的报告文学《咱们的五个孩子》,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六四年六月号。作为责任编辑,我在陪同冰心的采访过程中,学习了不少东西。这篇报告文学一经发表,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反响。首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发了它,又有许多国内及国外报刊转载,海内外热情的读者给冰心写来大量的信,既表示了对孤儿们的深深同情,又赞美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有的外国朋友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他们国家,这五个孤儿只能是流浪街头,生死未卜。

冰心对他们的关爱,以及报告文学作品和大量读者的来信,极大地鼓舞了五个孩子!他们不再感到孤独,感到生活窘迫,而是和千千万万新中国的少年儿童一样过着温暖幸福的生活。在阳光雨露下,五个孤儿在茁壮成长。

由于采写这篇报告文学的因缘,此后漫漫的几十年岁月里,冰心始终关怀着、挂念着、帮助着这几个可爱的孤儿。她有时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过年过节,有时给孩子们送去学习用的作业本和文具,有时还指导孩子们做功课……她给予了五个孩子人间最宝贵的爱,给予了孩子们家庭般的温暖,从而鼓舞了孩子努力学习、奋发向上。

不料,两年后,晴天霹雳,“文革”的风暴骤然而至!冰心和几乎所有作家一样,统统莫名其妙地被打倒,当做“牛鬼蛇神”关进“牛棚”,他们随之失去了自由。冰心和“牛棚”的难友们,被

勒令每天打扫地处王府井大街上的文联大楼的过道和写没完没了的所谓“交代”材料。因为是“牛鬼蛇神”,不许他们和任何“革命群众”接触和说话,否则就以“反革命串联”罪进行残酷批斗。

恰在这时,有天中午,我正在

见到沉默不语的冰心,小同庆眼泪汪汪地哭了!呜咽着说:“谢奶奶,我想你……”

冰心环视一下四周,悄声问道:“孩子,你怎么敢冒这个风险?”

“谢奶奶,我不怕。”同庆拉着

# 因为爱,所以永远

## ——冰心创作《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前前后后

周明



冰心先生与五个孤儿。右三为本文作者。

文联食堂用餐,十几岁的小同庆突然闯到我的跟前说:“叔叔,你怎么样?我很想谢奶奶!我想见谢奶奶!”我又惊又喜,奇怪她这么小的年纪怎敢如此冒着风险来找我我要见冰心?!那时文联大楼里楼外铺天盖地地贴满大字报,打倒这个那个,打倒“反动作家”谢冰心的大字报比比皆是!别的不认识,谢冰心几个字孩子还是认得的,可她竟然闯进来了!

看到小同庆那孩子般真诚的眼神和企盼的目光,我为之动心,决意冒一次风险让孩子见见冰心。因为正是午饭时间,“牛鬼蛇神”也在食堂吃饭,只是他们大都挤在墙角几张饭桌上,不能和群众同吃同坐。我要同庆先坐和文具,有时还指导孩子们做功课……她给予了五个孩子人间最宝贵的爱,给予了孩子们家庭般的温暖,从而鼓舞了孩子努力学习、奋发向上。

不料,两年后,晴天霹雳,“文革”的风暴骤然而至!冰心和几乎所有作家一样,统统莫名其妙地被打倒,当做“牛鬼蛇神”关进“牛棚”,他们随之失去了自由。冰心和“牛棚”的难友们,被勒令每天打扫地处王府井大街上的文联大楼的过道和写没完没了的所谓“交代”材料。因为是“牛鬼蛇神”,不许他们和任何“革命群众”接触和说话,否则就以“反革命串联”罪进行残酷批斗。恰在这时,有天中午,我正在见到沉默不语的冰心,小同庆眼泪汪汪地哭了!呜咽着说:“谢奶奶,我想你……”冰心环视一下四周,悄声问道:“孩子,你怎么敢冒这个风险?”“谢奶奶,我不怕。”同庆拉着

轮流着去医院探望。

时光流逝了四十多春秋,如今,“五个孤儿”都已先后成家立业,他们的下一代也已陆续诞生。而且他们已是一个十六口人的幸福大家庭了。

多年后,当年十五岁的老大周同山,已担任北京市供电局副局长多年,在这个重要的岗位上,他兢兢业业、吃苦耐劳、勇于开拓、忠于职守,做出了突出贡献。同庆在市委办公厅的岗位上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地辛勤工作。老三同来从部队转业到市农政局,担负了领导工作,在新的战线发挥了可喜的新贡献。聪明好学的同贺毕业于第二外国语学院,曾和爱人一起去法国做过商务工作,现在又在国内新的岗位勤奋努力地做事。那个最小的同义是供电局车队工程车的一个快乐的小司机,整日奔驰在首都大街小巷,为人们输送光明。

从前,还只是同山兄妹五个人的时候,每年春节,我们都是相约在同一个日子,初二、初三或初四一起去北京西郊给冰心老人拜年。后来五兄妹陆续结婚成家,有了孩子,添丁加口,人多了,我

等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冰心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她重新复出后,和许多老朋友都恢复了往来。可那当年“五个孤儿”的小朋友呢?他们现在在哪里?情况又如何?冰心一直念念不忘,牵挂于心。同样,孩子们也在惦念着他们热爱的谢奶奶,也在寻找谢奶奶。

终于有一天,阳光灿烂的一个春日里,冰心和已经长大了的“五个孤儿”劫后重逢,喜泪满面!孩子们对冰心奶奶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冰心呢,一会儿牵着同庆的小手走了过去,我含泪对冰心说:同庆要见你。冰心愣了一下,不知孩子要见她做什么。那时常常有莫名其妙的人可以随便批斗“黑帮”的,不想,一

轮流着去探望。

时光流逝了四十多春秋,如今,“五个孤儿”都已先后成家立业,他们的下一代也已陆续诞生。而且他们已是一个十六口人的幸福大家庭了。

多年后,当年十五岁的老大周同山,已担任北京市供电局副局长多年,在这个重要的岗位上,他兢兢业业、吃苦耐劳、勇于开拓、忠于职守,做出了突出贡献。同庆在市委办公厅的岗位上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地辛勤工作。老三同来从部队转业到市农政局,担负了领导工作,在新的战线发挥了可喜的新贡献。聪明好学的同贺毕业于第二外国语学院,曾和爱人一起去法国做过商务工作,现在又在国内新的岗位勤奋努力地做事。那个最小的同义是供电局车队工程车的一个快乐的小司机,整日奔驰在首都大街小巷,为人们输送光明。

从前,还只是同山兄妹五个人的时候,每年春节,我们都是相约在同一个日子,初二、初三或初四一起去北京西郊给冰心老人拜年。后来五兄妹陆续结婚成家,有了孩子,添丁加口,人多了,我

等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冰心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她重新复出后,和许多老朋友都恢复了往来。可那当年“五个孤儿”的小朋友呢?他们现在在哪里?情况又如何?冰心一直念念不忘,牵挂于心。同样,孩子们也在惦念着他们热爱的谢奶奶,也在寻找谢奶奶。

们便不可能再是六个人一同前往了。所以后来便逐渐改变为兵分三路、三路先后前往。

有一年春节,我们同冰心家人约定初二、初三两天上午我和同山兄妹分两批去给老人拜年。初三上午,我和老大周同山一家四口准时到达。

坐定后,冰心老人高兴地说:“昨天,同庆他们姐弟的四家人全都来了。今天,是‘局长大人’(指担任供电局副局长的周同山)驾到,见到你们都这么争气地成长起来,我是多么高兴呀!你们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你们还要好好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

说着,她转眼又对着我,嗷嗷嘴对同山幽默地说:“唔,咱们的结识、交往,周明可是桥梁哟!”

同山他们点点头,都会心地

冰心忽然回忆似地说:“那是一九六四年吧,周明陪我找到你们,采访你们的事儿。当时,我们访问的日程安排得很紧,一天去好几处,那真是马不停蹄哦。采访快结束时,我们想起还见到小同义呢!那时他最小喽,才三岁吧,昨天他来,也带来了新结婚的爱人呢,多快哪!”

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后,她又兴奋地接着说:“当时我和周明找到东厅幼儿园,小同义正在睡觉呢。我们没有叫醒他。老师好意,轻轻地掀起被头,把睡得正甜的同义的小脸露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他忽然睁起一双大眼睛,向我们微笑,一对惹人喜欢的小酒窝,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冰心说着,忽然又问周同山:“你们兄妹就同义有一对迷人的酒窝吧?”

周同山和他的爱人小宋乐得格格地笑。同山对于老人如此惊人的记忆力感到意外。他直点头说:是,是这样,就小义一个有酒窝。您还记得这么清楚!

冰心说:“那可不行!我怎么忘记呢?你们虽然不幸失去了父母,却得到那么多亲人的关怀,那么多认识和认识的人们的帮助!这件事,很使我动心哪!”

这时,她小小的客厅里充满欢声笑语。那摆设阳光灿烂的窗台和书柜上的几株盛开的水仙花,散发出阵阵浓郁的清香,充盈在整个客厅里,充盈在我们的心头。

由于“孤儿不孤”的事迹,当年引起作家冰心的关注,写了《咱们的五个孩子》报告文学,结果这篇报告文学的发表,又引起更多人对五个孩子的关心帮助。

此后,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也十分关心五个孩子的成长。在一九六四年八月的一天,邓颖超曾派车把周同山兄妹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一项与外国小朋友的联欢活动。那是五个孩子第一次走进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孩子们高兴得又唱又跳,老三同来直在红地毯上翻跟头。最小的同义直嚷嚷要邓妈妈抱,邓颖超抱起小同义,亲热地问:“幼儿园好

吗?都吃什么好吃的?”邓颖超一一询问同山兄妹学习、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努力向上。

联欢会将要结束时,邓颖超高兴地告诉五个孩子:“毛主席很关心你们。总理也关心你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向上……”

五兄妹受到极大鼓舞!还有什么比这更温暖呢!

周恩来总理去世后,邓颖超同志依然关心着孤儿们的成长。但由于工作忙,直到一九八四年的中秋节,邓颖超同志做出安排,要我和“五个孤儿”及其孩子们去中南海同她共度中秋佳节。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节日。

那天,天气格外晴朗。中南海碧波荡漾。当我和身着节日盛装的孩子走进中南海,穿过花树绿荫,沿着那郁郁葱葱花树间的小路,走上庄严、宏伟的西花厅的台阶时,邓大姐和秘书赵伟同志,已等候在门口。我们先是在西花厅前合影,而后进屋坐下。西花厅里充满节日的气氛,茶几上摆设了鲜果和精美的月饼。我环顾四周,发现在西墙壁上悬挂着一帧大幅周总理的画像。顿时,我感到总理那炯炯的目光仿佛在看视着我们,关怀着孩子们。

邓大姐让我们大家先尝尝月饼。她说:“今天是中秋节,咱们这一家人先过团圆节吧!”

这时,“五个孤儿”的孩子们一拥而上,高兴地喊:“奶奶好!奶奶节日好!”并向邓奶奶献上鲜花。邓大姐也兴奋地说:“你们好!你们好!孩子们节日好!”

邓大姐指着茶几上的月饼说:“这是我特意嘱咐给你们做的,都快尝尝。昨天,天气不好,我可担心了,真怕下雨淋着你们。今天早晨我特意听了天气预报,这才放心。我听说你们早就要求来看我,我也很想你们哟!因为我工作忙,直到今天才见到你们。你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怎么样呢?”

老大周同山代表五个孩子向邓奶奶汇报了他们成长的情况,邓大姐听后十分高兴,感到十分欣慰,勉励孩子们继续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邓大姐说:“这些年,因工作忙的关系,我对你们关心不够,帮助不多,但你们是有出息、有志气、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好孩子。要知道你们是跨世纪接班人的哪!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对于“五个孤儿”和他们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幸福难忘的中秋节!

恰恰冰心和邓颖超又是情深谊长的好朋友。冰心听到这次会见的情况后,也格外地高兴!

母爱固然源自给予人们血肉之躯的亲生母亲,但当生身之人已经逝去,世间仍然存在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的母爱之情。这种博大的母爱之情,是由芸芸众生组成的,也是由富有慈母之爱心的作家冰心表达的。五个孤儿四十多年的经历,便是深深感受到这种母爱的生动体现。



萧长华



郝寿臣

### 萧长华

萧先生八十多岁时身体还很好。腿脚利落,腰板不塌。他的长寿之道有三:饮食清淡,经常步行,回心无愧。

萧先生从不坐车。上哪儿去,都是地下走。早年在宫里“当差”,上颐和园去唱戏,也都是走着去,走着回来,从城里到颐和园,少说也有三十里。北京人说:走为百练之祖,是一点不错的。

萧老自奉甚薄。他到天津去演戏,自备伙食。一棵白菜,两



妙妙香

刀切四片,一顿吃1/4。餐餐如此:窝头,熬白菜。他上女婿家去看女儿,问:“今儿吃什么呀?”——“芝麻酱拌面,炸点花椒油。”——“芝麻酱拌面,还浇花椒油啊!”

萧先生偶尔吃一顿好的:包饺子。他吃饺子还不蘸醋。四十个饺子,装在一个盘子里,浇一点醋,特馋特馋,就给“开”了。

萧先生不是不懂得吃。有人看见,在酒席上,清汤鱼翅上来了,他照样扁着筷子夹了一大块往嘴里送。懂得吃而不吃,这是真的节俭。萧先生一辈子挣的钱不少,都为别人花了。他买了几处“义地”,是专为死后没有葬身之所的穷苦的同行预备的。有唱戏的“苦哈哈”,死了老人,办不了事,到萧先生那儿,磕一个头报丧,萧先生问:“你估摸着,大概其得多少钱,才能把事办了哇?”一面就开箱取钱。

“三反”“五反”的时候,一个演员被打成了“老虎”,在台上挨斗,斗到热火燎辣的时候,萧先生在台下喊“××,你承认得了,这钱,我给你拿!”

赞曰:

窝头白菜,寡欲步行,回心无愧,人间寿星。

### 美妙香

萧先生真是温柔敦厚到家了。

他的学生上他家去,他总是站起来,双手当胸捏着扇子,微微躬着身子:“您来啦!”临走时,一定送出大门。

# 名优逸事

汪曾祺

他从不生气。有一回陪梅兰芳唱《奇双会》,他的赵克。穿好了靴子,总觉得不大得劲。“唔,今儿是怎样搞的,我怎么总觉得脚高一脚低的?我的腿有毛病啦?”伸出脚来看看,两只靴子的厚度一厚薄二寸,一只二寸二寸。他的跟包叫申四。他把申四叫过来:“老四哎,咱们今儿的靴子拿错了吧?”你猜申四说什么?——“你凑合着穿吧!”

姜先生从不争戏。向来梅先生演《奇双会》,都是他的赵克。偶尔俞振飞也陪梅先生唱,赵克就是俞的。管事的说:“姜先生,您来个葆童。”——“哎,好好好。”

姜先生有一次遇见了劫道的,就是琉璃厂西边北柳巷那儿。那是敌伪的时候,姜先生拿了“戏份儿”回家。那会儿唱戏都是当天开份儿,戏打住了,管事的就把份儿分好了。姜先生这天赶了两“包”,华乐和长安。冬天,他坐在洋车里,前面挂着棉布帘。“站住!把身上的钱都拿出来!”——“他也不知道里面是谁。姜先生不慌不忙地下了车,从左

边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从右边又掏出了一沓。“这是我今儿的戏份儿。这是华乐的,这是长安的,都在这儿,一个不少。您点点。”

那位不知点了没有。想来大概是没有。

在上海也遇见过那么一回。“站住,把身浪厘值钿(钱)格物事(东西)才(都)拿出来!”此公把姜先生身上搜刮一空,扬长而去。

姜先生在后而喊:

“回来,回来!我这还有一块表哪,您要不要?”

事后,熟人问姜先生:“您真是!他走都走了,您干嘛还叫他回来?他把您什么都抄走了,您还问‘我这还有一块表哪,您要不要?’”姜妙香答道:“他也不容易。”姜先生有一次似乎生气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上姜先生家去抄家,抄出一双尖头皮鞋,当场把鞋尖给他刺了。姜先生把鞋刺了尖,张着大嘴的鞋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有人来的时候,就指指,摇头。

赞曰:温柔敦厚,有何不好?“文革”英雄,愧对此老。

### 贯盛吉

在京剧角里,贯盛吉的格调是比较高的。他的表演,自成一格,人称“贯派”。他的念白很特别,每一句话都是高起低收,好像一个孩子在被逼着去做他不情愿做的事情时的嘟囔。他是个“冷面小丑”,北京人所谓“绷着脸逗”。他并不存心逗人乐。他的“喂”是淡淡的,不是北京人所谓“胳膊人”,上海人所谓“硬滑稽”。他的笑料,在使人哄然一笑之后,还能想想,还能回味。有人问他:“你怎么这么逗呀?”他说:“我没有逗呀,我说的都是实话。”“说实话”是丑角艺术的不二法门。说实话而使人笑,才是一个真正的丑角。喜剧的灵魂,是生活,是真实。

不但在台上,在生活里,贯盛吉也是那么逗。临死了,还逗。他死的时候,才四十岁,太可惜了。

他死于心脏病,病了很长时间。

家里人知道他的病不治了,已经为他准备了后事,买了“装裹”——即寿衣。他有一天叫家

里人给他穿戴起来。都穿齐全了,说:“给我拿个镜子来。”

他照照镜子:“唔,就这德行呀!”

有一天,他让家里给他请一台和尚,在他的面前给他放一台焰口。

他跟朋友说:“活着,听焰口,有谁这么干过没有?——没有。”

有一天,他很不好,家里忙着,怕他今天过不去。他瓮声瓮气地说:“你们别忙。今儿我不走。今儿外面下雨,我没有伞。”

一个人能够病危的时候还能保持生气盎然的幽默感,能够拿死来“开逗”,真是不容易。这是一个真正的丑角,一生一世都是丑角。

赞曰:

拿死开逗,滑稽之雄。虽东方朔,无比优容。

### 郝寿臣

郝老受聘为北京市戏校校长。就职的那天,对学生讲话。

他拿着秘书替他写好的稿子,讲了一口气。讲到要知道旧社会的苦,才知道新社会的甜。旧社会的梨园行,不养小,不养老。多少艺人,唱了一辈子戏,临了是倒卧街头,冻饿而死。说到这里,郝校长非常激动,一手高举讲稿,一手指着讲稿,说:“同学们!他说得真对呀!”这件事,大家都当笑话传。细想一下,这有什么可笑呢?本来嘛,讲稿是秘书捉刀,这是明摆着的事。自己戳穿,有什么丢人?倒是“他说得真对呀”,才真是本人说出的

一句话笑。这没有什么可笑。这正是前辈的不可及处:老老实实,不装门面。

许多大干部作大报告,在台上手舞足蹈,口若悬河,其实都应该学学郝老,在适当的时候,用手指指秘书所拟讲稿,说:“同志们!他说得真对呀!”

赞曰:

人为立言,已不居功。老老实实,古道可风。